

论中国典当的历史传承与演进

施 欣¹ , 黄建军²

(1.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81; 2. 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 中国典当活动历史源远流长、典当文化博大精深、典当事业兴衰更迭。揆诸既往, 考镜历史, 其演绎脉络与嬗变轨迹: 滥觞于春秋战国; 萌芽于秦、汉两代; 兴起于魏晋南北朝; 成熟于唐、五代时期; 立行于辽金、两宋阶段; 鼎盛于明、清两朝; 衰弱于清末民初。回溯典当行业发展历程、探赜典当事业衍变进路、揭橥典当团体运行规律, 无疑对典当事业进步和经济制度完善具有镜鉴价值。

关键词: 典当; 传播; 演进; 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2016) 06 - 0155 - 05

On 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Evolution of Chinese Pawn Industry

SHI Xin¹ , HUANG Jianjun²

(1.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2. Jinag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Nanchang, Jinagxi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pawn industry has a long history, and the pawn culture is broad and profound. It rises and falls all the tim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the paper points out its deductive context and transmutation tract: Chinese pawn industry rose in the period of the Spring -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germinated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y, prospered in the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 Southern Dynasties, matured in the Tang and Five - Dynasties, continued in the Northern Jin and the Song Dynasties, reached its summi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eclin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covered and rebounded in the period of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and boomed and flourished in recent years. Looking back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route, and revealing the operation rules of Chinese pawn industry are undoubtedly of mirror value for improving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Chinese pawn industry.

Key words: pawn industry; spread; evolution;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典当(业)是社会演进到一定阶段及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中国的典当现象或行为与典当事业或行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是最为古老和重要的商(行)业之一,被视为商(票)号、银(钱)庄等现代金融业、银行业、信贷业的雏形甚或鼻祖。循此,它同钱庄、票号、合会等机构、组织以及私人借贷一起成为旧式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1]

收稿日期: 2016 - 08 - 12

作者简介: 施 欣(1984 -),男,江西宜春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4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

黄建军(1965 -),男,江西临川人,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经济史。

一、典当业的行业背景、历史沿革及发展脉络

1. 起源于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出于军事、政治及外交的目的,出现了以人为质、以城为质、以师为质的诸多实例,只不过当时的质当、抵押与交换往往出于战略需求或军事目的,与经济联系的较少,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其商业目的相当的淡。《左传·哀公十年》中记载“以王子姑曹当之,而后止。”^[2]这里所涉及的“当”即是“以人为质”,意图是为了避免诸侯国之间的互相攻伐。史书所载“秦昭王之子质于赵”、“燕太子质于秦”屡见不鲜,例如,秦王子楚就曾被送往赵国作人质,使得秦赵两国之间在举兵兴戎时不得不有所顾忌。又譬如,当时著名的“买卖国君”的大商人吕不韦和功成身退、泛舟太湖、被誉为“商圣”的陶朱公,就尝试过运用“典当”手段进行经济投机、集资扩产等商业活动。其间,甚至出现了“得黄金十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以信誉为担保的“人格典当”。因此,该时期的各类“典当”事件只能被视为是原始古老的潜意识的约定俗成的“典当”行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典当。

2. 萌芽于两汉

《后汉书·刘虞传》:“虞所赏赐,典当胡夷,赆数抄夺之。”^[3]是目前为止对于“典当”一词的最早记载,表明了典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在当时已经存在。刘秋根在《中国典当制度史》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因春秋战国以来高利贷的发展,动产抵押借贷至汉代已相当普遍,南北朝时期虽有所进步,却并无本质变化。”^[4]据此可以推断,典当行当在秦汉时期即已开始萌生。此时,金银及铜钱等货币,作为充当社会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已经获得了长足进展,甚至不少诸侯国可以合法铸币(如吴王制造的蚁币、齐国生产的刀币)。由于经济的发达、商贸的繁荣、城邑的扩大,人们对于货币需求越来越大,私人质货行为已经相当普遍,以致于民间高利贷活动十分活跃,催化与促生出了典当事业。自此,“以物质钱”的典当行为便在这种私人高利贷活动中正式萌芽。显然,私人典当行为与民间借贷业的萌生是汉代幅员辽阔、地域广袤、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的真实写照。

3. 兴起于魏晋、南北朝

范文澜先生曾指出“后世典当业,从南朝佛寺开始。”^[5]罗炳绵教授也认为,“典当业起源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南朝,是为解决寺院经济问题而设立的质钱取利机构”。^[6]由上述论断可知,我国的典当业正式发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南史·循吏传》中,不仅记录了关涉寺庙经济建设情形,也证明了寺院典当事业及机构的存在,它对当时寺库质钱的具体“典当行为”作出了较为明确详实的记载,用较重的笔墨描绘了从“质”(当钱)到“赎”(取当)完整的典当过程,典当对象不仅有农作物(稻米)、经济作物(如苎麻)、生活日用品(衣物)等当时的主要典当品,而且已有白银、珠宝、黄金、玉器等贵重金属物品。^[7]这是我国典当机构产生最早的、最明确、最确凿的史书(正史)记述。同时,也真实反映了当时典当事业的基本面貌,标志着我国典当行业正式从社会其他行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与金融行业分支(古代“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迅速成长为工商业者、小手工业者及城乡平民融通货币、周转资金、汇通货币的主渠道,标帜着封建时代专门典当机构的正式诞生。

之所以典当业在南北朝时期的得到发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首先,经历了东汉末年以来长时间的战乱,中国进入到五胡争先入主或称霸中原的时期。由于战争频仍,面对杀戮攻伐造成的生离死别,人们往往会产生强烈的避世求来生的愿望,因此大量民众转而信佛,投身寺院,以求得现实的逃避。这样一来增强了寺庙的势力,其中自然包括经济实力,促进了寺庙经济的发展,这就给寺庙成为典当机构奠定了相当厚实的物质、资本及人力基础,使之作为典押、贷借的中心成为可能。其次,当时所处社会的生产力还较为低下,百姓在战争的裹挟下生活难以为继,甚至基本温饱都不能保障,遇到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卖儿鬻女也不鲜见。为了维持日常生活花费,尤其在播种季节确保有一定的现钱购买种子、农具,以“典当”的形式来暂时通融、换取资金就成为了农民首选的权宜之计。再次,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统治集团内传播开来,乃至不少帝王将相亦带头崇佛兴佛。由于南朝历代帝王大都信奉佛教,给寺院的赏赐甚高。因此寺院经济发达,僧侣成为当时社会最富有的阶层之一。第四,达官贵人在皇帝“以身作则”式的带动下,为了生殖兴产和有所弋获,踊跃向佛寺捐钱捐物,举国上下形成了崇佛向佛的氛围。第五,由于当时寺院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往往成为商人展开贸易的场所。在商贸过程中,遇到商

人一时资金周转不灵,便将其携带或掌握的货物作抵押,应急式地向寺院借高利贷。古代典当业就此顺其自然产生。

4. 成熟于唐、五代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当时的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典当也从单一的“寺库质贷”逐渐发展为“官营、私营、寺营”三种质贷形式并存的兴盛局面。也就是说,从之前的寺庙垄断、单一转向官方势力及民间资本的多维介入。从那时起,典当的称谓繁复——有的叫“质库”,有的叫“柜坊”,有的叫“质舍”、“寄附铺”。尽管名称各异、花样百出,但万变不离其宗,皆从事或致力于“质钱”业务。《旧唐书·德宗纪》记载“建中三年(782年),大索京富商,所得才八十万贯。少尹韦稹,又取偃柜质库法拷索之,才及二百万。”^[8]说明当时的典当主财力雄厚、当铺积累了大量财富,竟然成为了某些官吏甚或朝廷敲诈勒索、快速攫取财物的对象。其实,唐时的普通老百姓已经将家具、衣服甚至牲畜、庄田作为物质换取钱财或银两了,成为黔首眼中司空见惯的经济活动的场所。此时,“由于公私质库争相牟取暴利,朝廷不得不严加整饬,颁布法令对质钱利率作出明确规定”。^[9]实际情况是,“质贷业”的昌盛使之成长为盛唐“最大的商业”,为便利市民、促进流通以及活跃唐朝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政府为此加强了监督并征收专项税款。由此可见,典当作为社会专门资金融通的特殊行业,此时业已发展至成熟。

5. 立行于宋、金

宋代的经济与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典当业随着当时都市(如开封、苏杭等地)商业经济繁荣日益发达,由分散、零星的小规模、局部的当铺等积聚成为一种与丝绸业、铁器业等可以比肩的重要行当。此一时期的典当,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譬如对典当称谓更为繁多,^①两宋时期,各地商品经济的繁荣和金融市场的活跃,极大地推动了典当信用业向新的方面发展,“其性质逐渐由原来寺院经营的慈善救济为主转为救济取利为首,既具有某种慈善救济性,也开始注重谋利性。”^[10]

由于宋朝各种行会组织相当成熟,可推测当时典当行会极为可能已经从市井工商诸业中脱颖而出成立了类似于现代的“典当行会”。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为了推动与鼓励典当业的发展,政府给典当行经营者“授郎官衔、着官装、免赋税”等三项奖励,这在封建时代确属难能可贵,甚至可以与西方的“重商主义”相媲美。就连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金朝也不甘落后,其政治制度与经济方式多效仿宋朝,其中典当业也不例外。据《金史·百官志》载“大定十三年,上谓宰臣曰:闻民间质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或以利为本,小民苦之。若官为设库务,十中取一息,以助官吏廩给之费,似可便民。”^[11]为了方便百姓、扩充国库,既减轻对民众的剥削,又提高朝廷的财政收入,金朝大臣建议由官方出资设置“库务”以开展质典业务。此外,为了便于集中管理,金朝政府在中都等大都市广泛设置名曰“流泉务”的官典,并派专门官员管理。值得注意的是,金世宗还专门制定《官营典当业管理规则》予以规制,这是我国历史文献中第一部由朝廷正式颁布施行的典当业管理规则,是典当行业成熟一个标志。

有必要补充一点,因典当业在两宋长盛不衰,率先出现了典当征税(确定税率)。据《册府元龟》所载“其有典质,倚当物业。倚官、才人、业主及四邻人同署文契。委不是曾将物业,已经别处重叠已当,及虚持他人物业。”该段行文是迄今为止历史文献中予以记载的最早一份有关征缴典当税及税务的文件(也是措施最为详细的纪事),当税率不详。^[12]还有,宋朝的当铺(或曰为“质库”、“解库”)已正式开办存款业务,典当行的业务进行较为规范、甚至从业人员身着特别的工作服。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典当不屑一顾,特别在士大夫中颇多微词,如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六》有云“今僧寺辄作质库钱取利,……至为鄙恶。”

6. 鼎盛于明、清两朝

随着社会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尤其是明朝末叶我国沿海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个体工商业及手工业的活跃和商业贸易的昌盛,均有效地刺激了典当业发展,给该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与潜在

^① 北方人谓以物质钱为“解库”,江南一带则叫“质库”,寺院又叫“长生库”、“普惠库”。由此还衍生出一些富有新意的名称,如“解典库”、“典库”、“抵当库”等。值得关注的是,称呼中开始分别出现“典”和“当”两字,视为最早冠以“典当”二字对整个行业予以称呼的源头,即以“典当”为正名最早出现于宋。

的动力。自此,中国典当业在明清两朝步入历史鼎盛时期。据史料显示,“康熙三年(1664年),按当铺税推算,全国约有当铺二万多家”,^[13]可见在“康乾盛世”期间,典当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究其原因,大略如下:元末明初,随着经济的复苏与生产力的进步,佛寺典当慢慢从萎靡不振、最终走向消失。而明太祖朱元璋因其自身的经历而认定典当行业是加重贪官污吏对农民盘剥的罪恶渊薮,对之极其憎恨,由此促使官营典当在明朝销声匿迹。但是,作为替换与补充,民间商业典当则顺势发展起来,典当业还是持续演进。明代的民间商帮所开典当业较为发达,典当资本主要以商人资本为主,并且占有全部典当市场份额。明末冯梦龙所撰《喻世明言》中“要到大市街当铺问个家信,那典铺在蒋家对门”的文字,^[14]说明到了明代末期,当铺已经成为民间的习惯用语。就明清两朝之间看,尤以山西晋帮和安徽商帮经营典当的规模为最大。至明代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朝廷为增加税源而专设“典税”税种,从一个侧面窥探出当时典当业的兴盛。

有清一代,典当业一度繁荣、进入黄金时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极致与高峰。据粗略统计:康熙二十四年,全国有当铺15000多家,^[15]典当业分布比“钱庄、票号业更为广泛”;^[16]乾隆年间,全国当铺共18075座,仅“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六、七百座”,年收典税9万两白银,乾隆皇帝还给典当业题词:“缓急相同、利国利民”。该时期的大贪官和珅就拥有当铺75座、资本达3000万两白银;嘉庆年间,全国当铺发展到了23000座以上,年上交朝廷税银达11万5千两,而且出现许多规模庞大、资金充裕的大当铺。由此可见中国典当业在明清之际的极盛之景。因典当丰厚的赢利,引来了皇宫贵族及官府胥吏纷纷投入到典当业,涌现出不少皇当、官当,从而呈现皇当、官当、民当三大典当资本鼎足的经营态势。更为重要的是,典当业内部分工更加明确、专业化程度加强、经营与管理水平同步提高,诞生了《典当须知录》等内部管理文献。

目前,研究者普遍认为“明清时期,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典当业日趋兴盛,到清代中期达到顶峰。”^[17]换言之,明清两朝的数百年间,我国的典当业由于各方面的因素促进而空前繁荣,以至于“成为地主、富商、官绅乃至官府、皇室投资取利的热点,不仅与人们的生活消费密切相关,而且已渗入到当时社会的多个层面,与国家经济、官僚政治、思想文化、习俗风尚、社会局面等都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18]因此,清代的典当或信贷被指为“执着平民金融之枢纽,操纵着平民生活的生杀大权”,^[19]进而得以赓续与持久。我国古代典当业发展到明清时期达到空前兴盛阶段,究其原因在于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及政府的“利典”政策,为明清典当业兴盛提供了良好社会环境;而典当业自身的行业特点,则成为明清典当业兴盛的内在动因。

7. 衰弱于清末民初

清末民初,由于军阀混战、外国资本介入,以及近代化的钱庄(银行)及借贷业务的兴起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下,旧有的封建地主经济制度与小农经济规则被打破,新的经济体制的创立、引进与延伸、蔓延,古老的典当业在内外多种“合力”下显得“不合时宜”、逐渐走向衰败。

民国甫立,并没有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什么好处,“有民国之名,无民国之实”,中国社会尚未从真正意义上进入“民国”(现代化国家及具有现代国家意识的公民)。这一状况,即使在民国形式上“统一”、大兴实业的快速发展时期有所好转,但依然不容乐观。探析其根源,则在于:“与钱庄业和票号业不同,典当业主要依托传统小农经济且其业务主要面向贫苦大众。因此,原有经济体系的变化,农村经济的恶化直接导致典当业失去了生存空间而逐步走向衰落。”^[20]哪怕是20世纪30年代的“黄金十年”,情况也没有好转,反而是江河日下。由于社会动乱、兵匪横行和经济恶化,民国政府不再把官款“发典生息”,使典当业顿时陷入了经营困境之中。一直作为典业重要支柱的银、钱两业和商家、私人也因社会动荡、百业凋敝而无能为力。典当业资本的源头及财产的注入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断绝,导致原始积累与流动资金贫乏与不足。此外,贫民当者有当无赎、无力赎回,激增的满货又挤占了典业的有限资本,阻滞了典业资本正常的流通与畅达的循环,典业利润微薄,乃至无从获利。民国滥发纸(法)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典业资本大为缩水、甚至形成暗亏。再加上“全国各地战乱不断、灾荒频频,刺激了社会的恐慌氛围,使资本家不敢投资于典业,无疑加剧了典业破产及深陷泥淖。”^[21]

二、典当衍变路径的史学分析与现实启示

典当这一经济行为或商务事业与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稳固、经济的平稳密切相关。综观历史,凡是国家分裂、军阀割据、外族入侵之时,必然经济凋敝、市场紊乱、民不聊生,虽然短期内可促进典当业的畸形发展,但是却极大地扼杀了典当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一般来说,“在社会安定、币值稳定时期,典当业的发展就比较顺利;而在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以及社会治安不稳定时期,典当业则呈现萧条的状况。”^[22]因而,政治安定才能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经济平稳才能给典当事业的壮大保障撑持,社会进步才能让民间资本自由流通。

典当这一经济行为或事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尤其是在改革不断深化、市场不断开放、经济不断搞活的新形势新常态下,积极赋予其新的内涵,努力做到与时俱进,向发达国家学习与借鉴。“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典当业兴盛的不竭动力。只有在生产社会化、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在广大地域上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经济联系,他们才可能为融通资金而找到途径,典当信用才可能出现。”^[23]任何时代,市场的繁荣,商贸的频密,交易的扩大,均表明经济运行良好,典当业便与之偕好。质言之,“只要商品货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经济的发展便离不开一定的金融支持。作为高利贷资本活动形态之一的典当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发挥它的作用,因而它为古代的生产、流通、生活所必须,在古代社会它能稳定地发展。其经济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即表现在这里。”^[4]

参考文献:

- [1]高石钢,郑丹丹.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典当业发展状况及特征分析[J].开发研究,2015,(2).
-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4]刘秋根著.中国典当制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 [6]罗炳绵.中国典当业的起源和发展[J].食货,1978,(7).
- [7]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8]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9]唐玄宗.宋本大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0]陈国强.浙江金融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 [11]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2]孙洋洋.浅谈清末民初重要区域典当行业的发展及影响[J].活力,2011,(12).
- [13]文史天地编委会.古代典当业[J].文史天地·文史快车,2009,(1).
- [14]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15]黄鉴晖.中国典当业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
- [16]程泽时.管制与恤民:清代典当业省例[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3).
- [17]常红萍,王亚军.明清江南农村典当探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8,(3).
- [18]郑小娟.论明清典当业兴盛之原因[J].黑龙江史志,2009,(1).
- [19]张一凡.我国典当业之研究[J].中国经济,1934,(8).
- [20]高石钢,郑丹丹.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典当业发展状况及特征分析[J].开发研究,2015,(2).
- [21]李国俊,卢伯炜.从申报看辛亥革命后苏沪等地典当业的经营[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4,(1).
- [22]陈峥.清代至民国时期桂北民间典当业述论[J].贵阳学院学报,2015,(1).
- [23]吕建锁,赵丙奇等.浙商典当业的历史变迁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2014,(2).

(责任编辑:方兴)